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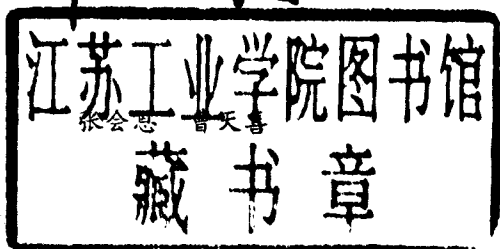
上章叢話

张会恩 曹天喜

湖南日报编辑部



文章叢話



湖南日报编辑部

编者的话

如何把文章写得文理通达、语言流畅？这是每个通讯员和写作爱好者常常思考的问题。为顺应读者要求，《湖南日报通讯》从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起开辟《文章丛话》专栏，约请湖南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中国写作学会湖南分会会长张会恩及讲师曹天喜为专栏撰文。两年多来，他们以章一熙笔名撰文二十三篇，较广泛地介绍了文章写作的基本知识，较系统地论述了文章写作的基本规律和方法，刊出后，受到读者欢迎。

现在，我们将已发表过的二十一篇和未发表过的二篇还有张会恩老师撰写的《题记》，汇编成册，以飨读者。

目 录

一、题记	(1)
二、文题琐议	(3)
三、立一篇之主脑	(8)
四、文章的血肉	(13)
五、深明题旨与精选材料	(18)
六、驭文之首术 谋篇之大端	(23)
七、所谓“匠心独运”	(28)
八、所谓“大体须有”	(33)
九、“凤头、猪肚、豹尾”	(39)
十、“大开大合”与“尺水兴波”	(44)
十一、“以蓄意为工”和“以简要为主”	(49)
十二、线索在手 惟吾所施	(55)
十三、“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	(61)
十四、绘景与寓意	(67)
十五、文贵情 情贵隐	(72)
十六、论如析薪 贵能破理	(79)
十七、有物、有序、有文	(85)
十八、“辞达而已矣”	(91)
十九、“语不惊人死不休”	(97)
二十、百炼成字 千炼成句	(104)
二一、再谈“千炼成句”	(110)
二二、长短造变 骈散兼行	(117)
二三、略论文章缘起	(123)
二四、试论“立言得休”	(132)

题 记

两年以前，湖南日报社的同志约我就报刊文章的实际，写点介绍文章知识的文字，当时我正参与编写《文章学概论》，心想新闻体裁的文字正是文章的一大门类，可以借此熟悉新闻体裁的写作，便欣然应允下来，并拟了一个文章的栏目：文章丛话。

说是“丛话”，原也不曾预想一定要写尽文章A B C的各个方面，后来动笔了，就想：总得约束一下思考的范围，决定只从文章的题目谈到文章的语言，而不涉及更多的方面。虽然在谈的过程中免不了要牵扯到很多写作训练的实际，但更多的时候是把文章当作客观存在的实体来加以研讨，以印证所阐发的理论知识的。

在写作过程中，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尽可能融汇贯通一些古典文论。在长期的文章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深感到，外国的文章理论近几十年来输入甚少，中国古代的文章理论尤其缺乏研究和继承。但继承优秀的古代文论传统，吸取外国文论的营养，确是建树和发展社会主义时代的文章理论、文章学的需要。二是尽可能联系报刊文章的实例，而且只论文章，不录文学作品。但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谓“文章”，

包括散文和报告文学，因为它们都是写真人真事，真情实感，是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事理的文体，是在我们所论狭义的“文章”范围以内。这两方面的努力显然还很不够，未能做到尽善尽美，这只是一种尝试，请读者多予批评指正。

接受约稿伊始，我就料定自己的时间不济，便邀约曹天喜同志帮我撰写部分篇目，他也爽然领意，于是就用了“章一熙”这个名字，现在文章既已发完，也必须向读者作个交代。

因为报社同志拟将这一组文章编印成册，而且嘱我题一个书名，并说倘有文章没有发完，还可补缀于后，因检上案头有关文章学论文两篇一并付梓，或许于读者不无帮助。拉杂说来，是为“题记”。

张会恩

文 题 琐 议

文章题目的重要，从它的名称也可以看出。题，《说文》：额也。额，《说文》：顙也。顙，《玉篇》：额也。额是头的要害部位，同“目”一样重要。古书上说，“目”是“肝之使也”，“心之符也”，“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文章的题目，正如人的头目可以左右人身反映神情一般，既控引全文，又反映全文思想和艺术的风貌。

但在战国以前，我国文章没有题目。现在见到的《诗经》、《左传》等的篇目，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墨、孟、庄、韩以后，文章才有题目。后人虽然也有“无题诗”，但名曰“无题”，实亦有题，不过不便标明罢了。外国诗文也有一些没有题目，如美国惠特曼、印度泰戈尔的短诗。“题目”一词始用于何时，未曾确考。《后汉书·许劭传》云：“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劭）为己目。”《注》云：命品藻为题目。《晋书·山涛传》云：“涛所奏甄拔人物，各有题目，时称《山公启事》。”大概自汉以后，“题目”一词才逐渐使用。

好的题目，常使文章叠彩生辉，文章家们于此颇费经营。鲁迅回忆青少年时代的散文，原曾总题为《旧事重提》，后改题为《朝花夕拾》更见形象，更富情韵美。雨果小说《可怜的人》，总觉平庸俗气，后更名为《悲惨世界》，才感精彩贴切，涵蕴丰富。著名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报道焦裕禄同志的动人事迹，原曾设想过《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儿子》等多种题目，都欠妥贴，最后才拟定这个既

切身份、业绩又合报道宗旨的题目。报道击剑英雄栾菊杰的理由曾为他的文章拟了《一舞剑器动四方》、《青春在剑锋上闪光》、《银剑凝霞光》、《扬眉剑出鞘》等几个题目，并请人斟酌，最后才选定《扬眉剑出鞘》这个闪烁着“新时代毫光”、源出《天安门诗抄》的题目。可见题目的选用，何等慎重，显示出文章家们的见识和才华。

文章的题目，有虚有实。《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不读内容，难明旨意，比较虚；《将革命进行到底》，一看题目，大意了然，比较实。同样，《变色龙》比较虚，《竞选州长》比较实。《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比较虚，《望着周总理的遗像》比较实。大凡论说一类文章题目，重实较多，而记叙、抒情两类文章题目，偏虚较为常见。当然也非绝对如此，《丢掉包袱，开动机器》属于论说一类，而题目较虚。但不论虚实，也不论何种文体，题目都应做到准确、鲜明、生动、简洁。

“准确”，就是文能对题，题能统文，文题相称。茅盾的《白杨礼赞》，赞美的是党所领导下的北方抗日军民正直朴实的品格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与力争上游、极富生命力的白杨树非常酷似。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所写既是亲见亲闻，又是心造幻境，情景交会，丝丝入扣。“鲜明”，就是新颖、独特，引人注目。朱自清的《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振聋发聩，倾向鲜明，表达了伐强怜弱的不平之情。曹靖华的《三五年是多久》，用的疑问句式，包孕独特，造成悬念，发人兴致。“生动”，就是有形象，见情趣，添韵味。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仿佛看见伟大领袖欢颜动笑的情景；这是结束了斑斑血泪史，看到了灿灿远景图

的欢笑，有情有神。朱自清的《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文题诗化，勾人驰想，韵味无穷。“简洁”，就是言简意赅。丰子恺的《渐》，一字点染题旨，冰心的《海恋》，两言概括情景，即使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也无一字虚设。

文章的题目，或用单词，或用词组，或用短语，应视文体特征、作品风格和个人写作习惯而定，但不管怎样，总要做到：或则概括文章内容（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或则提示文章范围（刘少奇《论党》），或则透露主题消息（周恩来《学习毛泽东》），或则暗示文章写法（《从画蛋所想起的》），或则点露文章意境（杨朔《画山绣水》），或则袒露写作动机（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好的文章题目，有如锥处囊中，往往使主题脱颖而出，又有如山村酒肆，旗帜高挑，产生极大的诱力，又有如清水芙蓉，天造地设，没有半丝做作姿态。现今报刊题目多数平淡无奇，空泛老套，叫人厌读；但也有不少标题新颖、独特，耐人寻味。今试以本报一九八一年九月底至十月底的部分文章题目为例，稍加研讨，提出若干标题的方法以供参考。

有意造成正反相成，使题目含蕴某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大胆放手，切莫撒手》，又要“放手”，又不“撒手”，这就构成矛盾，怎样解决？文题一下就抓住了读者。原来实行生产责任制前后，干部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卡死不放”和“撒手不管”。文章指出，“卡死”和“撒手”都在事物的“两极”，都不对，只有大胆放手，又不撒手，才是“得其环中”，比较允当。又如《“见义勇为”与“见利勇为”》；比论永兴小孩为救落水同学光荣牺牲和桃江电

坝翻船不救落水人命而争抢财物二事，“义”、“利”互见，对立于一题之中，一字之差，境界有天壤之别，作者态度鲜明，臧否适当。

借用成辞成句，或稍加变化，使文题“诗化”。《春色满园关不住》是借用现成诗句，《与人相处而不净乎？》是脱化古人语辞，意在响应中央号召，重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秋瑾祠堂何处寻？》是脱化“丞相祠堂何处寻”的诗句，意在引发读者于长沙街头寻找秋瑾祠堂的兴趣。

《山乡处处“喜鹊”飞》和《恭请“仙女”下“凡”来》，一用衡阳“喜鹊”牌单车名字入题，将题“诗化”，赞美一部分农民已经富裕起来，购买力大为提高，一嵌湘潭“仙女”牌电扇名字入题，批评名牌产品或高踞于橱窗之上或出没于“关系户”门庭之中，而到不了老百姓的“凡”间来。一赞一讽，情感真切，极富韵味。《三堂会审，当场拍板》是借用古戏曲中的成语成辞，说明经济工作中的地区与部门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现象已找到了妥善协商、迅速解决的办法，贴切生动，是新闻中的好标题。《社队拖拉机要改“驾”归田》又多了一番创造，利用谐音特点，改“解甲归田”为“改驾归田”，颇切时宜。这类借用或脱化成语成辞的题目，只要借用得当，脱化巧妙，读来琅琅上口，常可大生异彩。

借用、改造人民群众中习用俗话、口语为题，增强文题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如《“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借用群众武术生活中的俗话，赞美某烟厂干部多次拒收礼物的崇高品德，贴切，形象。《“三板斧”砍得好》和《跌一跤买个明白》也是用群众口语入题，一赞新干部上任的新经

验，一论某体操队因骄傲而惨败的教训，文题自然亲切，不啻自己口出。

据实提炼，凝为警策，使文题精粹醒目。《不把职权当筹码》、《退而不休，为国分忧》，是提炼人物精神境界特征的，《接一答二招呼三》、《方寸之地也有潜力可挖》，是浓缩柜台服务经验和火柴经营管理经验的。《“三靠”和“靠三”》则是农民今昔心理的概括：过去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用钱靠救济，是曰“三靠”，今天靠三中全会精神，治穷致富，是曰“靠三”；“过去三靠，愁吃愁穿，生活不得温饱；如今靠三，有粮有钱，日子越过越甜。”“三靠”“靠三”，巧妙倒装，对照显豁。此类题目，概括力强，声韵谐和，易于诵记。所须谨慎者，不要误入“帮”风一类文字游戏的套套。

以上四法，比较常见，但绝非全部。如见商店售货员互相“闲话”，以致弄错售货价钱，与顾客争吵，便以《闲话“闲话”》为题著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造成揶揄效果；又如到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售票员总是死板着脸，便以《千金难买一笑》为题作文，产生讽谕作用，凡此等等，都是好方法。

标题的方法，应该丰富多样，不宜一格以求。学习的方法，是云集各种不同内容、不同文体、不同色彩、不同风格的题目，仔细揣摩玩味，然后予以概括归类，上升到理性认识。

立 一 篇 之 主 脑

如果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那么题旨就是文章的灵魂。人无灵魂，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文章没有题旨，就等同一盘散沙。本报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的评论《批评·棍子·挡箭牌》，光就题目平列的三个概念，是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但一读全文，就豁然开朗了。原来，棍子不能打，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能丢，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以不准“打棍子”来作为抵制正确批评的挡箭牌。这就是该文的题旨。正是这一题旨，象一种粘合剂，将批评、棍子、挡箭牌三颗彼此游离的沙子粘在一块了。也正是这样一个主旨，象灵魂或者象主脑一样，给那三项互不关联的材料注入了生命，使其构成一个有机体。没有这样一个主脑，一个灵魂，沙子可能还是沙子。

可见，文章的灵魂或主脑，在文章的诸要素中至关重要。古今中外，凡是认真写作的人，莫不视之为治文章的“要务”。

日本《朝日新闻》的一个记者曾说，他写新闻报道，第一是确定主题，因为它决定文章的成败。美国新闻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在其专著《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谈到主题的意义时，也写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建立在作者所要表达的某种观察、情感或意见的基础上的。”

我们的先人，更是讲究文章的“命意”、“炼意”、“立主脑”的功夫。“文以意为主”，几乎成了文章家们的座右铭。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这一推崇前人、教导后人的警句，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稍后的刘熙载，对“主脑”的作用说得更为透辟：“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主脑既得，则制动以静，治烦以简，一线到底，万变不离其宗，如兵非将不御，射非鹄不志也。”（着重点为笔者所加）有了一篇之主脑，文章要长能长，要短可短，动态可以化作静态，烦琐可以变成简约，自始至终一线贯穿，都围绕着主脑展开，就象军队一定要有将帅统领，射箭必定要以靶心作为目标一样。这话说得多么在理！他们所说的“意”或“主脑”，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题旨”、“主旨”的意思，也就是今天常说的“主题”或“中心思想”。“主题”这个词，是近代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因为它的适应性强，于是反宾为主，成了写作理论中的专用术语，而我国传统文论中的形象性很强的“意”或“主脑”以及“题旨”、“主旨”等反而越来越用得少了。其实，我国古代写作理论的遗产是极为丰富的，可惜我们今天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加以系统的总结和科学地继承，还做得很不够。

题旨重要，人所共知。然而，在一段时间里，有些人对它却不太感兴趣了，有的甚至否认作品要有主题，好象只有这样才算解放了思想，谁要讲究文章主题的高度和深度，谁就是极左的檀香木脑筋没有开窍。文艺可以不顾政治，作品也就可以不要主题了。放开手脚写吧！管它风花雪月、剑侠色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到哪里算哪里，作文就是目的，别的是没有的。殊不知，“主题”并不为无产阶级一家所专有，不顾无产阶级的政治，必定要顾及其他什么阶级的政治，

口称没有“目的”，实际上目的是有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鼓吹作文不要主题，至少是不顾创作实际的天方夜谭。

但是，由于主题是作者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现实生活之后的一种认识、评价、理想，是提炼题材后的思想结晶，所以，一篇文章的主题，势必打上时代的阶级的和个人的思想烙印。地域不分中外，时间不论古今，重视主题，人所共同。但文章主题的深浅、正误，则往往因时地而互异，因人事而不同。在今天，要想为新时代写出雄浑的乐章，唱出高亢的声调，首先作者本身要是一个“战斗的无产者”（鲁迅语）。在现实生活的海洋上，到处闪耀着思想的光华，“但却只有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能找到它”（王汶石语）。每个从事写作的同志，都有责任自觉地拿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站在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上，去观察社会、分析生活、提炼主题。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好文章。

题目的基本要求是正确、深刻、集中、新颖，令人爽心悦目，使人留下鲜明的印象。陈练的随感《“倒写”两则社会新闻》（见本报81年5月25日），就有这样的效果。作者从两条因婚姻问题而引起的违章犯罪的报道中，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于是借报道而作文，批评婚姻上的旧风陋习。主脑一明，写来就很顺手。他只是将原报道题目“倒写”一下，稍加阐发，而一个正确深刻的主题，就脱颖而出了。全文仅四百余字，是一篇短小精悍，令人读后不忘的好杂感。

要使题旨做到集中、正确、深刻、新颖，就要在“炼意”上多下功夫。文章大师们总是在实践中，训练出一双锐

利的眼睛，善于从现有的材料中去深掘题旨，提炼文意。比如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八面来风》（《人民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二期），虽说是报告一位年轻厂长的生动事迹，但作者的眼光并没有停留在事迹本身上，而是从这一青年的思想风貌上，洞察出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对于人物的深刻影响。所以，与其说是歌颂人物的艰苦奋斗精神和远大胸怀，倒不如说是通过这个典型事例，表达作者对党中央在广州搞特区试点的肯定和赞扬，揭示出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如何正确对待今天的青年，如何正确看待外来的影响，如何坚定我们正确的振兴中华的方针。最后，作者驰骋她的美好想象，用一句凝炼的哲理语言，将“一篇主脑”生动形象地凸现在读者面前：“南风窗（指广州特区）开了，八面来风，……行船就是要借八面风，进，岂怕风！”“进，岂怕风”就把主题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一经这样的升华，文中那些游离于人物事迹之外的叙说，也都自然地粘结为一块了，全文所写的一切都一齐跃动起来了。文章的内容是极为有限的，而留给人想象，玩味的天地却是极为宽广的。读着它，油然生出“学富五车”的感觉。

文章家们成功的写作实践告诉我们，题旨不能外加，不能虚拟，必须从现有材料中去开掘，去提炼。所谓开掘与提炼，就是要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思索再三，揭示“本质”，提取“精要”。只有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题旨，才坚实可信，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假大空的东西，再漂亮也是一朵纸花，谁稀罕呢！反过来，一篇文章的主旨，“越是摆脱了就事论事，透过个性去揭示共性，就越发反映了时代的真实、生活的本质”（理由语）。因此，我

们在锤炼文意、确立“一篇主脑”的时候，要努力摆脱生活中的一孔之见，一隅所感；心胸要宽阔，目光要远大，要能由木而及林，居高以临下，让文思潮涌，任想象飞腾。这样，文章的主旨才会深邃透底，新颖精辟。现在有些报刊文章，纯粹为迎合某种趣味或某种需求而作，往往辞浅而意浮，事乖而理偏，非‘左’而即右。这种文风不正的毛病，仍然是党风不正、学风不正的表现。一个行端坐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必违心地、草率地趋时弄笔的。

宋代范温《潜溪诗眼》云：“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主题蕴藏于社会的土壤里、生活的素材中，只要我们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真正沉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工于命意，着意提纯，一篇篇题旨集中、正确而深刻的文章，就一定会辉映文苑，为我们的时代，为我党的事业，尽到“鼓与呼”的神圣义务。

文 章 的 血 肉

毫无疑问，题旨是文章的灵魂。但是，这个“灵魂”既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从海外飞过来，只能从生活的土壤里、丰富的材料中产生出来。因此，文章家都以为：材料是文章的血肉。

材料对于文章的意义是：形成题旨，又表现题旨。没有丰富的材料作为基础，题旨就无法抽象、无从提炼；离开材料，凭空给文章填上一个什么思想，那一定会是勉强的、空泛的，甚至虚假的，因而也就是荒诞无稽的。正如一个人，血肉之躯既已不复存在，还侈谈什么活的灵魂呢？同样，题旨如果没有充足的材料来表现，那就成了赤裸裸的、抽象的理念，是不可能动人心弦、启人肺腑的。

所以，我们作文章，最忌讳“空口打哇哇”。毛泽东同志当年为“党八股”列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那么反过来呢，就是要笔无虚文，言之有物了。要有物，就要有材料，有充实的内容。毛主席强调战争时期，“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其实，和平建设时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当前的“四化”建设、机构改革来说吧，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务实，要振奋精神、鼓足干劲、争取时间、提高效率，要果断地割除“四化”机器上的肿瘤。空洞无物的文章对这宏大的事业会有什么益处呢？大家都很忙，他们需要的是能解决实际问题、能解答理论疑难、能鼓舞斗志的有血有肉的文章。

材料是文章的血肉，作文章不能没有材料。古人也早就看